

第 *i* 部分

优势视角的哲学、原理和语言

i

第一章

前言：人的力量

Dennis Saleebey

优势视角：哲学理念、概念和原则

优势词典

优势视角原则

若干初步设想

结论

参考文献



立足于案主优势的观点已经在专业社会工作领域获得毋庸置疑的认可。教科书的作者、教育者和实践者都意识到这个原则的重要性。但强调关注案主的优势和能力的呼吁似乎还只限于专业领域。我们要澄清的是：优势视角是对传统社会工作实践的一次戏剧性飞跃。优势视角取向的实践意味着：作为社工（社会工作者简称，全书同）所应该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要立足于发现和寻求、探索和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梦想，并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抗拒社会主流的控制。这是一个多层面的实践手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工和案主的真诚和创造性、勇气和常识。它是一个案主和社工合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并不是纯粹的功能执行者，而是有目的的主体。这一视角强调人类精神的内在智慧，强调即便是最可怜的被社会所遗弃的人都具有内在的转变能力。当采用优势视角的时候，你可以期望你工作的本质和你与案主关系的激发将发生惊人的变化。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或有一段时间认为）我们在发展案主的优势，但有时我们又做得不够。优势视角的实践要求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案主、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现状，不再是孤立地或专注地集中于问题 而是把目光投向可能性。在创伤、痛苦和困难的荆棘之中 你能看到希望和转变的种子。其实这个公式很简单：动员案主的力量（天才、知识、能力和资源 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 这样 案主将会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尽管这个配方并不复杂，但你也可以看到，工作并非如此简单。在接下来的几章里，你将会看到优势视角在不同人群和不同环境里的运用。你也可以见到评估的方式、运用的模式、应用的范例以及从以问题为本转向优势聚焦的相关问题的讨论。

过去几年来，人们对以优势为本的视角应用于实践的兴趣日渐增加 尤其是个案管理 并针对不同的人群 如老人、问题青少年、吸毒人

员、长期精神病患者，甚至在社区和学校 Benard, 1994; Clark, 1997; Kretzmann & McKnight, 1993; Miller & Berg, 1995; Mills, 1995; Parsons & Cox, 1994; Rapp, 1998)。除此之外，迅速增多的不同领域的文献、研究和实践都与优势视角有相似之处，如成长性抗逆力、治疗和健康、寻解导向疗法 (solution-focused therapy)、资源为本的社区发展、叙事和故事等等。运用这些方法的潜在动力有很多方面，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回应我们的文化对心理病态学、受害者、变态行为、道德和人际行为变异的过分痴迷。从医学到制药，从保险行业到大众传媒，都经由强调我们现在（或在不久的将来）是集情感、身体和行为的毛病于一身而获得不菲的利润。我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是由于早期生命中的毒素而使我们变成容易受伤和脆弱的个体。《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 (DSM-IV)》(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和其最近的改进版本 DSM IV TR (APA, 2000) 相比，其较早先第三本的厚度已经增加了两倍，而其中的间隔只有七年。

我们不仅笼罩于疾病和障碍，我们中的不少人也成为不断壮大的精神健康专业人士的牺牲品，把精神健康变成了一个可以欣欣向荣，并具巨大收益的行业。在牧师、心理治疗师的指引下，我们热切地去探寻我们受伤的童年时代，并从家庭背景中找到那些让我们呈现出如今状况的余毒。如果你仔细聆听，你可以在如今的某些文化迷恋之中听到福音的回响。这些也是文化偏好。杰瑞·斯普林尔脱口秀（美国有名的搞笑节目，以讨论各种异常话题出名——译者注）并非异常，除非涉及它排斥滑稽场面和毫无品味的东西。Gergen(1994) 注意到精神健康专业与文化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的结果，即不断恶化的“不断虚弱的循环”(p. 155)。他戏谑地说：

我有多少不是？让我数一数：冲动性格、诈病、反应性抑郁、厌食、狂躁、注意力缺乏障碍、精神变态、外在控制取向与自信不足。

(p. 148)

以上观察并非要无情地忽视那些个人、家庭或社区的真实痛苦和挣扎，也不是要把我们的视线从施加于孩子身上的虐待现实移开，更不是要否认被毒品所吞噬的灵魂，而是要与我们社会中病态心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民间、道德和医疗这样的分类方法划清界限。我们要抛弃多数人受到伤害、经历创伤或忽视之后就会不可避免地为他们伤痛所痛苦且变成需要可怜的人群的观念。我们所要做的是还社会一个平衡，把看人看事的角度加以调适，并帮助那些正在受伤害的人。这种平衡很难达到，因为优势和抗逆力这样的词汇才刚刚萌芽且正在发展之中，因此还有很多不足。Sybil 和 Steve Wolin (1997) 是这样谈及这两个范式 风险和抗逆力 的：

其结果是，抗逆力范式与风险范式不成对比。谈及人类从伤害中修复的能力、内在优势和保护因素，专业人士突然感到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当他们试图用资源丰富、希望、创造力、能力等等的词语去取代病态学的专业术语之时，他们在摸索那些词汇，感到自己对那些词汇如此生疏，自己的认识如此幼稚。我们相信抗争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进行，即提供系统性、发展性的优势词汇以抗衡我们领域中标准的病态术语。（p. 27）

社会工作如同其他所有的助人专业，未能幸免于以疾病和障碍为本的思维方式的感染。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立足于这样的假设：案主之所以成为案主 是因为他们有瑕疵、有问题、有病理和疾病。他们确实就某种程度而言是有问题和缺陷的。这一取向来源于以往对穷人、被遗弃人群和离经叛道人群的道德瑕疵的确信。现代社会有更加详细分化的术语，但影响我们思维和行为的隐喻和叙说却远远多于那些健康有益的语言，而这些负面语言的建构影响了我们所要帮助案主的命运。对弱势、虚弱和瑕疵的相信也影响了其他人如何看待我们的案主，以及案主如何看待他们自己，资源如何分配到不同的案主人群。总而

言之，如此的称谓会导致惩罚性规定。

病态学词汇背后有的是一系列的假设，这些假设反过来为案主刻画出了一副并不可爱的图画。其中的一些假设和他们的结果归纳如下：

这个人有已命名的问题或病态。对于各种类型的诊断标签很快就会变成案主的“主要身份”（Becker, 1963），如此称谓和角色将另外的地位笼罩其下。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成为精神分裂患者。这是一个如此普遍的惯例，以至我们可以不假思索。一旦被标示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他的性格、经验、知识、愿望等另外的因素将慢慢地退到后场，代之以症状和病症的语言。关于这个人的谈话不可避免地疾病意象所宰制，与病人的关系也围绕这些指称而重构。从某种程度来看这些标签凝固，个人便经由一个退却和依赖加强的过程而成为一个永久的异类身份（Gergen, 1994; Goffman, 1961; Scheff, 1984）。它们并非价值中立的术语。它们可以分隔那些有病的人和没有病的人；此种区分如果不是生理的（如住院），至少也是道德上的。那些被贴上标签的人，无论是以微妙抑或野蛮的方式，其社会声望或地位将被贬低。然而，这些标签为若干痛苦的个人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了解脱方法，最终就是如此。另外，标签肯定要比恶魔缠身这样的想法好得多。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为许多自我孱弱的人创造了一个情景道德的、心理的和公民的。（Gergen, 1994, p. 150）

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语言：专业犬儒主义（**professional cynicism**）强化案主的问题导致一系列对案主、案主的环境、案主应对环境的能力的悲观期望和预测。进一步地，这些标签有蚕食效应，重复的次数多了之后，就改变了案主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周围人对他们的看法。长远来看，这些变化融入了个人对他们的自我认同。Paulo Freire (1996)许多年来一直认为，压迫者的观点和希望对受压迫者有着离奇的、难以缓解的影响。在这些曾经被视为奇怪的观点之下，受压迫者开始在他们的知识和理解方面屈从于让他们痛苦的人。

聚焦于问题出在何处，通常显示个人对应付他们生命中的挑战或修复他们自己的能力有极大怀疑。 Andrew Weil (1995) 批评其医学领域中那种深层的悲观主义和负面思想，认为人体有趋向变化、重生和自我治疗的倾向。

当我听到医生们以不同的方式将他们的悲观向病人传递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要为我的专业感到尴尬。我正在致力于要求医学院要告诫学生语言的力量，并要求医生在与病人说话时要极其小心地措辞。一个更大的主题，是涉及医生更加注意病人投射给他们的力量和以影响健康变好而非变坏、刺激而非延缓自动治愈的方式将如此力量返回的可能性的问题。（p. 64）

情况是如此之差，以至于 Weil 把这叫作医疗的魔法——医生恐怖的医疗预言和可怕归因，它强大到制造了病人的焦虑、害怕、抑郁和退缩。这是生物医疗模式所共有的后果，这一种模式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工作实践。这种生物医疗模式及其在社会服务领域有着更广泛影响的类似模式如“技术/理性主义者”(Technical/Rationalist) 模式 (Schon, 1983) 蔑视自然治疗和人们知道何为对与错的能力。特别强调物质层面，这些模式抛弃整体功能性和事物的确切性。社会工作对问题和障碍的强调以及专业之中持续对缺陷和病态的理论强调，促使将人视为特定问题的载体和单一问题的混合体。这样一种态度让社会工作专业远离下列所宣称的、历史的兴趣对人处于环境之中、理解人们纠缠其间的制度与人际关系之网、在恶劣环境之中再生与涅槃的可能性。

距离、权力不平等、控制和掌握标志着助人者和受助人之间的关系。那种认为我们具有可采用的以经验为本的或理论支持的技巧是自欺欺人。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导致了案主与社工之间的距离。距离本身 无论是阶级、特权知识、机构角色或规范位置 都会显示出助人者与受助人之间的不平等。结果，案主的观点或许会变得毫无作用或毫不

相干。在讨论“抗拒案主”问题时,Miller (1997) 如是说:

如果治疗师认为或暗示案主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成立的,或贬低、抵触案主“抗拒”就应运而生。毕竟,如果不是受挫,谁愿意被提及不足、被批评、被判断或者感觉要跟随指令?我们所常说的抵抗在很多时候正反映了案主想挽救自尊的努力。因此,某些情况却没有可能,因为这样的治疗让案主根本没有办法去“保全面子”或提升自尊。(p. 12)

造成分离、非人性化的最确定的路径是个案材料的制作,通常案主的材料是由一些如 DSM IV TR 或青少年犯罪记录代码的身份标识组成。更有甚者,许多机构的法律或政治规则、体现与机构的制度和精神的社會控制因素打击了案主与社工之间建立进一步的合作伙伴关系。

环境的脱离(context-stripping)。以问题为本的评估鼓励对案主个人式的而非生态式的述说。当我们将个人转变为案主之时,我们仅仅考察他们如何适合某一类别。这样,我们就忽视了案主生活的重要要素(文化、社会、政治、精神和经济)以及他们如何导致、维持和影响一个人的挣扎、失败或错误。可笑的是,在处理个案时,我们并非没有个人化。相反,我们是在为每一个人找一个适合的诊断代称,由此将案主视为众多之中且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从而,所有患有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的人就变得更加类似,区别也更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选择性地毁掉或至少忽略情境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并非评估的核心内容,但它们可以很好显示案主在特定场景下的与众不同之处。它们也可能是表示帮助、转变和问题解决的重要资源。

假设所有的障碍都由疾病导致,于是就假定问题的解决之道必在于此。认识毒药就找到了解毒的方法。但在人类关系和人类经验世界之中,原因、疾病和治疗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理念忽略了人类情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样做也就是把个人、家庭、朋友、邻居及所有日常生

活中涉及的人所可能带来改变的能力和资源抛在一边。在文化和精神的领域内，有的是转变或自愈的平台。他们其实假定了问题实质（自然或非自然？精神或世俗？）和它的解决方法之间的联系。但把这些工具置于医疗科学模式之下，就为改变注入了一系列的家庭和文化载体。

人世间问题的解决方法通常都是在与情况和案主持续的对话中经由对问题的重述和解释而开始。这些方法在某一时间、某种情况之下对某个案主来说是好的方法。他们可能可以改变案主的理解、选择或行为，但这些方法却只是暂时的和有局限性的。重建解释的能力不仅有赖于问题与方法之间严格的关系，而且有赖于直觉、默知识、预感和概念上的冒险 (Saleebey, 1989)。Schon(1983)对专业知识和行为之间概念上的张力作了描述，这也反映了严密与相关性之间的张力。相关性要回答这些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案主会对其重要问题进行咨询？他们想要什么？需要什么？他们想如何得到？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情况、问题和可能性？他们想将什么价值最大化？到此为止他们是如何应付这些问题的？对这些和另外的相似问题得到越多的答案，我们就对案主不同的特质、能力和人生经验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这些问题的提出要求社工和案主要有反思、寻找和制造意义的兴趣。 Iris Murdoch 说，当我们回家并共度一天的时候：

我们正艺术性地将材料改变为故事形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作为文字使用者都置身于一种文学氛围之中，我们生活和呼吸之间都有文学的气息。我们都是文学家，我们在不停地运用语言，并从那些也许原本看起来枯燥或杂乱的体验之中构建有趣的形式（转引自 Martingly, 1991, p. 237）

找到合适的词语去描述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和人生的现实，找到另外的词语来反映最真实的可能性和希望，这就是以中庸的和非科学的方式去探求庆祝的理由和愿景的源头。

优势视角：哲学理念、概念和原则

在此我想讨论之所以称其为优势视角的两个哲学原则，以澄清优势视角的立场。但值得注意的是，我有时会在一些极其混乱和复杂的现实生活场景中讨论这一原则。

解放和赋权：英雄主义和希望

解放基于这样一种可能性理念：选择机会、承诺和是否在相对透明或前途并不明朗的情况下行动。我们有强大的力量和潜能，其中一些尚不为人所知，一些则埋藏很深、尚未开发，而另一些的确在我们周围闪闪发亮。人、政策、遭遇、习俗、偶变性和概念都在滋润和孕育 或者破坏和摧毁这些力量。我们内在的某处有一种渴望成为英雄的情结且已赋予不同的名义 去超越环境、发展自己的潜能、面对不幸、站起来、被认同。许多时候是社会机构、压迫者、其他人 有时是出于好心 把这样的愿望给打消或摧毁，于是这样才可以让其他人得利、达到目的。毋庸置疑，无论如何沉默都好，这些珍贵的愿望都得俯首称臣。对于治疗师、人类领袖、牧师、老师、社工来说 找到可能和不可想象的方法去保存这些愿望，并以一种对生命肯定的表达方法去表达，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如果人们都按照他们的角色做好本分工作和定时交税，事情将会进展得顺利得多。解放给机构和个人的压迫倾向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总体而言 解放释放了人类的精力和精神、批判思维、挑战权威、质疑传统思想和智慧，找到了新的生存与行为的方式。但解放也可能是柔和的、谦逊的。我们也许要尝试新的行为 建立新的关系 或作出新的承诺。希望和相信可能性是解放的核心所在。保罗·法艾尔 这位伟大的解放主义导师去世之前在其最后一本书《希望教育》中提到了之前被他所低估的希望的力量：

在为推动世界进步的斗争尝试中不抱有希望，好像这样的战争可以被减少为你单独计量的行为，或是一种完全科学的手段，这无疑是一种轻佻的幻想。脱离希望（即把对真理的需要作为斗争的道德本质）的努力无异于否认抗争者于其间的中流砥柱地位。希望作为本体需要，决定了对实践的需要。没有一点希望，我们无论如何都难以开展抗争。（pp. 8~9）

异化和压制：焦虑与邪恶

我们周围的环境让我们无法否认严厉和专制的机构、关系、环境和领域的存在。怀疑、憎恨、战争、屠杀、压制以及众多无声但具破坏力的设置将人类分裂，将他们视作可憎的人群，以非人的方式对待之，所有这一切每天都在提醒我们邪恶、兽性和专制的存在。但为什么邪恶的力量与成为英雄的驱使力相伴而行呢？

我们有多少时候因我们所见到、听到或读到的事而拍案而起、瞠目结舌和震惊不已？残暴的兽行、滋生于狭隘与怨恨的暴力，我们怎么可以任由其发生，而唏嘘不已呢？然而，我们不是在很多时候被迫去做一些或成为牵动别人情感或身体痛苦的一分子吗？而那些人与我们又有什么区别？为什么？

我们是弱小和易受伤害的。宇宙是无限的。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时间的无垠和空间的广阔之时，我们为我们的微弱而颤抖。有时，应对我们的恐惧和战栗的最好办法，就是个人或集体地将事物操纵在我手中，以应对针对他人的恐惧和憎恨。于是我们屈服于不确定性，模糊了我们的弱小。甚至某些暴力或边缘化的行为，成为了“永不灭亡的项目”，旨在蒙蔽我们自己机能的易受伤害性和最终死亡的事实。（Becker, 1973; Fromm, 1973; Rank, 1941）

在毁坏、灰烬和压迫的残余之中，可能出现人类精神、英雄资产。由此，我们都有可能被拯救、被重建和重生。然而，历史的流逝、全部重建

和毁坏的荣耀最终在生活的缝隙中找到它们的路径。这些一扫而过的通则也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单亲妈妈和她 10 岁的女儿，她们来到你工作的家庭服务机构。母亲很担心她的女儿，说她曾经很乖，很孝顺，也很快乐，现在却变得很沉闷，无法沟通、焦虑和脆弱。她在学校的表现也是每况愈下，她的朋友看起来对她都无关重要。父亲离开得太突然，使她们陷入了经济的拮据之中。这是她母亲年少时结下的错误姻缘，最后的结果是让她陷入经济困难当中。但她说，对整个家庭而言，他走了其实更好。母亲说她担心女儿的情况可能与他半年前的离开有关系。于是，作为社工的你用接下来几周的时间去了解她们母女二人的情况。最后你发现，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女孩在身体和性方面被他父亲残害过。她自己发誓永远也不对别人说，包括她自己。从来不让他知道他对她的伤害有多深，从不！而且她守住她的誓言直到他离开。现在她崩溃，很悲伤，感到很愤怒，且感觉到身体被伤害之痛。但是在被毁坏的废墟上，这个年幼女孩抵住困苦的精神却在滋长着。现在，社工和她母亲决定要与这个不可思议的小灵魂结成联盟。

我们注意到，制作一篇充满技术和理论的有吸引力的文章，如果被问题和病态所占据，它的用途便变得不是那么理想，特别是涉及帮助案主成长、发展和改变方向、实现其愿景，或修订他们的个人意义与叙事的时候。接下来是一组支持优势取向的词汇，以及作为优势视角核心所在的实践原则的简要介绍。它们旨在赋予你一种重要感觉，即什么样的心理架构可以作用于个人与团体所需的优势。

优势词典

“我们可以做”威廉·詹姆斯（1902）在反思康德关于概念的看法时这样写道，“如果真的有上帝，感到我们真的是自由的，想象自然中好像充满了特别的设计；把我们试想作永生而来计划我们的人生；于是我们

会发现，这些‘做’的语言和句子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中起了一个如此重大的作用’(p. 55)。语言与词语具有权力，它们可以提升与鼓励，或是诋毁与催灭。如果语言是促成个体自我感的养分之一，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仔细对我们的帮助词典进行审查，以便了解我们的词语是否有利于案主。任何实践的方法都有其一套语言，最终会对案主如何看自己 and 如何行动有着巨大的影响。不仅如此，我们的专业指导对我们如何看待案主、他们的世界和他们的问题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优势实践之中，一些词是基本的，它指导着我们去认识和欣赏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的财富。

赋权(**empowerment**)。尽管赋权这个词很快成为陈词滥调，但赋权意味着帮助个人、小组、家庭，以及社区在其内部或周围探求和扩展其资源与手段的意图和过程。 Stephen Rose(2000)对于其职业生涯中的赋权实践有如下之说：

赋权实践的核心所在能将其理解为一种表达关系，而非一种技术或手段。在赋权关系之中，意义被重新赋予每一个人；获得信任是基于对实践目标的清晰认知；探索与社会结构及其利益相关的互动；案主的生活同时在意义层面被预期为与众不同，但群体的或以人群为本的生活则在宰制和系统障碍层面被预期为与众不同。(p. 412)

探求人们和社区内部的力量，我们必须推翻和抛弃歧视性标签；为家庭、机构和社区的资源连接提供机会，让受害者远离这种思维定势；抛弃父爱主义；信任人们的直觉、陈述、观点和精神；确信人们的梦想。 Barbara Levy Simon(1994)将赋权的概念建立于五个理念之上：与案主和委托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扩大案主能力和优势的强调；关注个人或家庭与环境；将案主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将个人的精神指向一直受到剥夺和压制的人群。追求赋权的目标需要有对民主必要性的确

信。它需要我们去解决紧张与冲突，去对付压制我们的受助人的机构和人们，促使我们去帮助人们从他们的抑制中解放自己（Pineerhuges, 1994）。在太多情况下，助人专业人士（尽管社会工作很小心地避免自己陷入这个陷阱）试图以一种父爱主义的态度来避免这样一种定势，即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号召人们去做正确的事，优势视角提供了另外一种态度和承诺：个人和社区的优势是可以再生、可以发展和可以扩展的资源。更有甚者，个人的资质总是植根于一个利益与牵连的社区之中。由此，社区和成员的概念在优势视角中至关重要。

成员资格 (membership)。米歇尔·沃尔泽这样写道，没有成员资格就好像处于一种“无限危险的状态”。没有成员资格有被边缘化、异化和被压迫的危险。人们需要成为市民，为他们的社区负责，成为有价值的成员。对所有人而言，将人们从其根基的“处所”隔离，将颠覆公民和道德的力量。优势取向从承认我们服务的所有人如同我们自己一样，是一个种类的成员，并享有与成员身份随之而来的自尊、尊重和责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帮助的人没有任何地方安生，也就没有所谓的归属感。成为成员和市民，享有参与权和责任，保证和安全等特征是赋权的第一步。成员资格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人们必须走到一起，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需要得到满足，不公平受到重视，从而实现他们的梦想。Jonathon Kozol 富有才华地描述了那些遭受贫困、挣扎于无知与敌意之中、缺乏关爱、被外界世界的毁坏政策所影响的人群（特别是儿童）的生活经历。他描绘了庇护、新生与成员资格之处所。南布朗克斯 (South Bronx) 的圣安教会和学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马修 (Marthu) 修女和牧师邀请了孩子和成人参加。分隔和分离于主流社会的现实并不远离圣安的大堂。

尽管现实中确实有隔离和背叛，圣安却不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地方，至少它的走廊和教室被孩子们填满：在这里到处有着他们的笑声、他们的发问、他们的纸板、他们的笔记本和他们的嬉戏。这是

一个有着不可抗拒的活力、精神和各式希望，并不时有着单纯快乐的地方。对邻里的成人而言，这是一个充满力量的地方。尽管当他们于危机之中来此寻求牧师的帮助之时，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一开始就显得如此之大。（2000, p. 33）

同样的可以信赖的精神被注入全国的社区建设和邻舍发展项目之中，Lisbeth Schorr（1997）进行了这方面的调查，并对社区建设项目的成功之处作出如下判断：

社区建设……是一种取向甚于一种技巧，一种信念甚于一个项目，一种前景甚于一个活动，它催化着扎根于本地生活和优先性的变迁过程。社区建设回应邻里之间的个人、家庭和机构的发展需要。它改变了邻里与其界限之外的系统之间的关系本质。社区自己的优势（无论是见于教会中、酒吧里、当地领导中）或是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被视为核心所在。（pp. 361～362）

你可以注意到社区建设定义中所包含的优势视角的构成成分：赋权、成员制 当然还有本土的抗逆力。

抗逆力（resilience）。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正在使得人类的一个规则，而非例外更加清晰可见：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超越和克服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

无论是好还是坏，有赖于人们的视角，只有 1/3 的孩子在面临严重压力时退缩，大约有 2/3 的孩子并不会那样。抗逆力研究目的是看这 2/3 的人如何击败他们的困难，并找到其中的原因。（Wolin & Wolin, 1996, p. 246）

很多文献资料都显示，特别的压力事件，甚至那些仍在发生的事件并不必然导致伤害、适应失败和精神问题（Katz, 1997; Werner & Smith, 1992; Wolin & Wolin, 1996）。抗逆力并非是对个人困难和伤痛人生经验的漠视，也并非是对生活中痛苦的天真忽略。它是一种面对

磨难而抗争的能力。伤害已经造成，情感和身体的伤疤已见证了这一切。对许多人来说，虽然伤口还在，然而这样的经历具有指导意义。抗逆力是一个过程——源于迎接自己世界的需要和挑战的关于能力、知识、洞察力和美德的持续成长和阐明，尽管这是矫正性的。

治愈和整合 (healing & wholeness)。治愈意味着整合和调动身体与心灵的机制，去面对障碍、疾病和断裂。治愈也需要个人与更大的社会与物理环境之间的良性关系。对人类而言，事物的自然状态经历了无数时间的演变且从细胞到自我形象的每一个组织层次，所有的过程都是对个人心灵与身体的修复。如同抗逆力研究文献向我们所展示的那样，尽管他们可以有妥协，但个人确实有自我纠正倾向 (Werner & Smith, 1992)。看来情形是所有的人类机能都有治愈的倾向。当然，进化的传奇可能受制于创伤、环境毒素、躯体解组，以及并非不重要的我们的某些专业介入理念和体系。但其底线是，如果自动治愈在一个人身上神奇地发生，你就有理由相信它也可以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如此的机体独创性可视为常识。否则，我们如何可以作为一种生物在没有医院、健康维护组织、医生、精神病专家、药剂师或心理医生的成百上千年内存活。治愈的效果出现于治疗师或个人与机体结成联盟或注入权力以自我恢复之时 (Cousin, 1989; Pelletier, 2000; Weil, 1995)。治愈和自我再生是生命支持系统的内在本质，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在大多数时候它会接受召唤。这样的现实无论对于医学抑或助人专业而言，都具有转折性的启示。至少它挑战了那种以为只有专家才知道怎么对案主最有利，以及治愈或转变都是因为外界因素影响的疾病模式。在某种意识层面上如 Roger Mills (1995) 所提醒的 我们具有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当遭到机体或环境的挑战时应该如何应付的朴素智慧。

对话与合作。人类的存在有赖于与他人有意和无意的关系。没有如此的互动，我们就无法对某人的力量进行探求与检测，就没有知识，没有个人意识与内在优势的提升。在对话中，我们确认别人的重要并